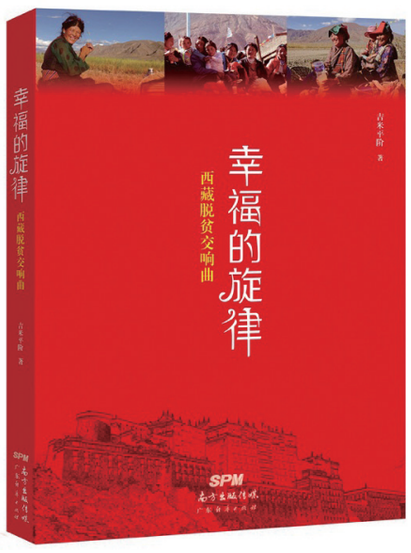
来自雪域高原的铿锵“老腔”

——读吉米平阶《幸福的旋律——西藏脱贫交响曲》

□潘凯雄

2019年12月23日，对西藏乃至整个中国而言，都是一个值得特别铭记的日子。这一天，西藏自治区脱贫攻坚指挥部发布公告，西藏最后19个贫困县（区）达到摘帽标准。至此，西藏62.8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74个贫困县（区）全部摘帽，综合贫困发生率由25.32%下降到零。

其实在这个时间点前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宣告全面脱贫者，并非独此一家，但西藏全面脱贫的意义绝非一般。让我们穿越时空隧道，回到上世纪50年代：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正式签订；1959年3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就此彻底废除。改革前的西藏，90%以上的人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人均预期寿命仅35.5岁，文盲率高达95%；贫富悬殊，发展迟滞，占人口不足5%的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几乎占有西藏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河流、河滩以及大部分牲畜；1951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仅为1.3亿元。60年的时光过去，西藏的社会形态由野蛮的奴隶制大步跨越到社会主义社会，经济上从积贫积弱、贫富悬殊进入全面摆脱贫困、共同奔小康的新时代。西藏的全面脱贫绝对堪称亘古未有的人间奇迹。



吉米平阶创作的《幸福的旋律——西藏脱贫交响曲》，就是一部记录表现西藏全面脱贫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长篇纪实文学，先后被列入“记录小康工程”国家出版基金专项资助项目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献礼出版物。这部30万字的长篇纪实之作分为四个乐章，每个乐章在一个“引子”的导引下又进一步细分为若干章，在总计55章的框架中分别记录了昌都、日喀则、阿里和噶尔等地的乡村脱贫故事。虽尚不能称之为“全景式”，但这种以点带面的形式同样足以展示出西藏近10年间脱贫攻坚的历史足迹。其历经艰辛沧桑所迎来的历史巨变和辉煌成就，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正确的治藏方略，以及广大干部群众脱贫攻坚的决心和坚忍不拔的毅力。

文坛近年集中涌现出了一批表现全国各地脱贫攻坚奋斗历程的主题性纪实文学作品，仅就本人的阅读比较，吉米平阶这部《幸福的旋律》，下述两个特点十分突出鲜明，是其特色所在。

首先，这曲“幸福的旋律”最终得以奏响，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作者亲历亲为后的感动与冲动。作家坦言：“作为一个在脱贫攻坚战线工作过的写作人，除了幸运，我觉得我有责任记录下我的所见所闻。”这里所谓“工作过”，指的是2011年在全国开展的创先争优活动中，西藏创新模式，开展了覆盖全区的强基础惠民生活动，也就是在全区当时的5451个行政村、居委会都要派驻由自治区、地（市）、县、乡四级组成的驻村（居）工作队，与最基层的老百姓同住同劳动，帮助他们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作者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受命带领西藏文联的12名同仁前往藏东昌都地区八宿县林卡乡的叶巴村、尼巴村和普龙村驻村。一年后，驻村工作虽已结束，但作者前后又“回去了好多次”。这段经历应该就是成就作品“第一乐章昌都：一个村庄的故事”的基本源泉与动力之所在吧。再往后，只要有机会，吉米平阶都会到西藏的农牧区采访，“多是从拉萨出发，从318国道一路向西到达阿里札达县的萨让乡和底雅乡、噶尔县的典角村、日土县的班公湖等西部边陲之地，有时又从日喀则出发，沿白朗、康马、江孜、亚东、岗巴、定日、吉隆一线，大都顺边境线而行，或者走昌都沿317大北线经那曲到阿里”。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述作者的这些夫子自道，是因为在《幸福的旋律》后三个乐章中，都能发现与之重叠的痕迹。是否也可以这样说：《幸福的旋律》既出自作家的心灵咏叹，也是追随自己脚步节拍的一种忠实记录。

其次，这曲“幸福的旋律”除去结构上存有“序曲+四个乐章+尾声”的交响乐痕迹外，整个主体内容的构成倒不如说更像一曲以最原始风貌出现的“老腔”，那种“土得掉渣”的原生态记录和质朴无华的叙述几乎贯穿全篇。比如，关于脱贫攻坚的具体手段，诸如异地搬迁、住房改造、现代教育、医疗保障、环境保护、人工种草、蔬菜种植、鲑鱼养殖、家庭旅馆、民族工艺、旅游开发……凡此种种，都成为吉米平阶谱就的旋律中一个个具体的音符。比如写如何在脱贫攻坚中强化政治思想组织保障时，诸如创建“藏西先锋·红色阿里”、“藏西中心·党建先锋”、“党支部+合作社+农牧民（贫困户）”、配齐所有村（居）第一书记，配齐配强村（居）组织班子等十八般武艺尽入囊中；比如那些身处最基层的脱贫攻坚领头人，先后就有当热村的老村长洛桑、阿亚村的党支部书记王朝、国措村的党支部书记魏伟、切玛村的党支部书记巴桑、多庆村的党支部书记米次、岗嘎村身残志坚的丹增欧珠、托桑林村的党支部书记阿旺久美、玛嘎村的新老书记们、桑旦林村的旺扎夫妇、努堆村的党支部书记坚参、桑巴村的自主创业者旦增、阿里直属库义务讲解员久美老人、森布村第一书记黄小龙、下吾村驻村干部尼玛伟色、“全国诚实守信模范”“最美奋斗者”尼玛顿珠……正是有了这样一大批在最基层带领乡亲们扎实奋斗、勤劳苦干的领头羊，这曲“幸福的旋律”才得以演奏得那么齐整、那么和谐。而这种还原现场、还原其人、还原其事的特色，实际上也是作者秉承自己的创作理念与原则的一种具体表现。

在阅读《幸福的旋律》的过程中，我时常回想起自己曾有过的几次短暂进藏和前往青海藏区的经历，尽管与吉米平阶的这种广泛深入完全不在一个层级，但他的作品却屡屡让我脑海中闪现出挂在藏族同胞——无论男女、不论长幼——脸上那质朴、真诚和温润的微笑。我想，吉米平阶的这部纪实文学新作，最能拨动我们心弦的，不也恰是那种质朴、真诚和温润的气质吗？

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文学创作的新时代视野

——简论文学创作的社会审美

□陈亚军

看历史、读社会、品人生，文学作品始终能够给予读者有益的启示。在接受美学理论中，社会接受性始终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审视对象。如果能够从文学创作的社会性中去寻求审美价值，那么作者就有了这么一种能力：打通文学作品和读者之间的隔阂，向社会传递审美意蕴，在情感或精神上引起读者共鸣，从而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

梁启超曾在评价潘光旦时说：“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文学“情绪”不该停留于浅显，满足于一般性的“感时花溅泪”，完全可以在“深刻”上做一番功夫。例如，在追究人的本质的时候，是不能不对人的社会位置、社会身份和社会态度加以关注的，它们不仅为人物活动创造了舞台和依据，还把人性的展露置于现实多重的社会关系中。文学创作不能忽略人与现实社会相互关联的复杂性，无论是人生命运还是人性状态，终究是离不开社会的，它们在社会生活中呈现、于社会关系中活跃、随社会转折而变化。一言以蔽之，文学创作者的社会审美追求，就在于社会本质、“人学”本质和审美本质的有机统一。

社会进步和发展，是文学创作的认知关键

在对文艺作品的评价方面，恩格斯提出了“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这一文艺批评标准。美学观点就是要看作品是否具有艺术性，历史观点则是将作品放到一定历史条件下，看其内容是否具有理解历史进步的积极意义。

现实生活是文学创作的背景和场域，是文学作品生发的土壤和养料。1979年，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提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就是说，文学创作者要在社会认知和社会实践的基础上，通过特殊的文学事实和感情来揭示社会运行状态，展现满带时代风尘、投入社会生活的人们。为此，文学创作对国家政治不能不知，对社会发展目的不能不明，兹事体大，关涉格局，影响立言。

我们正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以及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我想，能够为文学创作所捕捉的生动而丰富的素材，就藏在社会发展的细节中，那些曲折的人物命运也正裹挟于社会矛盾处。马克思指出：“社会的进步就是人类对美的追求的结晶。”作家在向读者提供文学作品的同时，也呈现了一个社会状态的文本。事实证明，发现和欣赏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美，需要洞察力，也需要思考力。更重要的是，要善于以现实国情作为考察社会活动的出发点，懂得社会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这个道理，否则不仅不能看到现实社会的发展趋势，还会被细枝末节、沟沟坎坎的现象所蒙蔽，显出一叶障目的无知。

在文学创作活动中，对社会发展状况的感受力是有差距的，有大小强弱之分。如果能够在社会愿望、过程阶段和成熟条件等方面，有敏感、丰沛、深刻的感受力，就把握住了在文学创作中留下“叙事性历史文献”的前提。这里试举一例：因有人质疑茅盾的《子夜》对1930年中国民族工业困境描述的真实性，近期有学者考察论证了当时缫丝业、火柴业、棉纺织业、面粉业和烟卷业等行业的发展情况，最后认为这部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正在于它的客观性，即正确而典型地反映出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现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文学创作的精神凝结

崇高，是来源于视觉的主客观融合的美学概念。它所产生的激昂情绪和庄严卓越的审美效果，培育了人格情操，提升了精神境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我们这个时代既有崇高之理想，也有崇高之事业，更不乏崇高之人物。文学创作者应该分辨这些崇高，描摹这些崇高，让读者从文学作品中感受到热情与力量。

恩格斯早年曾讲到民间故事的社会教化功能，认为民间故事可以让农民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得到精神慰藉，“使农民有明确的道德感，使他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自由，激发他的勇气并唤起他对祖国的热爱”。美的力量丝毫不逊于思想的力量，尤其是从文学审美中获得的精神飞翔，可以让人挣脱凡俗的煎熬与羁绊，直达脱胎换骨的新人模样。

文学创作者的社会责任，就是看到新的社会现实，把握新的社会经验，理解新的社会需求，以文学作品的审美形态，描摹社会生活和闪光人性，并把营造社会认同感、培植社会凝聚力作为“历史的参与者”的崇高事业。美是道德上的善的象征，可以肯定地说，先进与落后、善与恶同时存在，这是现实社会的真实。应该如何认识这种客观现象、如何叙述这种矛盾冲突？“苍蝇似的思想，垃圾桶里爬。”这一诗句出自闻一多的诗集《死水》，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专注低下和丑陋作为文学个性而加以推崇，以至于将文学创作理解为追逐消极因素、揭开肮脏之地的专门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工作者的自身修养不只是个人私事，文艺行风的好坏会影响整个文化领域乃至社会生活的生态。”那些具有社会价值和意义的文学作品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创作者对如何维系社会关系价值的探索之力甚锐，对社会历史进步的思悟之势甚强。

笔墨所至，精神顿出。现在我们所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反映了时代发展的丰富内涵，集中体现了当代的中国精神，是社会文明构建的重要软实力之一。我们应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进入文学创作的思想门槛，尤其在社会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发生变化时，文学创作更应当反映和推动社会历史进步，透露和揭示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新的时代信息。更重要的是，要在对社会生活和社会事物的美的探索中，将社会美的核心落实在人的外在与心灵美的集合上，把人的社会性和精神性的根本属性，透过文学作品的情节意象、人物活动生动地展现出来。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文学创作的新时代视野

以民族与社会关系为视角，详细说明民族与国家整体关系，是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著名理论内容。他认为，统一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倘只讲多元，把每个民族作为封闭的单位，是忘记了民族之间的复杂联系和共生性；或只讲一体，则忽视了民族历史和现实的丰富内涵。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民族关系是至关重要的社会关系。民族关系的特殊内涵，就在于既有社会性又有民族性。这种民族多样性结构成为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为此，文学创作所追求的社会美，应该建立在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背景下，体现这一心理特征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把关心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关注民族团结创新方式作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重要方面。倘用哲学方式表述，那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项重要的社会意识，原因就在于它反映了对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自在存在的坚实历史基础上生长出的现代民族叙事的察觉与关注。

在民族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社会审美应聚焦各民族的合力，展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社会共同体面貌。民族从属于社会，适应社会发展；社会离不开民族，民族发展也影响着社会进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就是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各民族全方位的交往交流交融意识，是历经长期的社会生活培育而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形成了利益相关、情感相通的互嵌式社会结构和民族共同体的社会形态。

在文化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社会审美应聚焦中华民族文化集大成的特点，叙说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中华民族文化是一个内涵和外延极为丰富的概念，展示了民族社会交往融合的历史过程，呈现了各民族的融合之美、整体之美。悠久坚实的民族文化不仅是社会历史最通透的魅力所在，也是我们国家以自信自强自立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所在。民族文化认同是最广泛、最深层次的文化认同。

文学创作涉及民族社会考察、民族文化视野和民族情感指向，反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生活，呈现了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状态，内涵丰富又有规律可循，开启了文学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学问、一种文学社会学的可不断完善的专业体系。学术研究则是另外一种路数，是在社会审美所赋予的灵感和热忱下，把社会精神和文化作为审美的主要领域，从而推出影响读者的情绪、心理和思想的文本，改变读者人生、推动社会发展。

报告文学《库布其与世界》：多向世界讲好中国治沙故事

□本报记者 李晓晨

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境内的库布其沙漠，在过去十余年间犹如一颗新星逐渐为人们所瞩目。从自古以来的荒漠化地区到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典型，在这里，数不清的治沙人贡献了无穷的智慧与汗水。2017年9月，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大会在鄂尔多斯召开，“库布其模式”由此成为世界标杆，为全球荒漠化治理提供了具有典范性和启示性的样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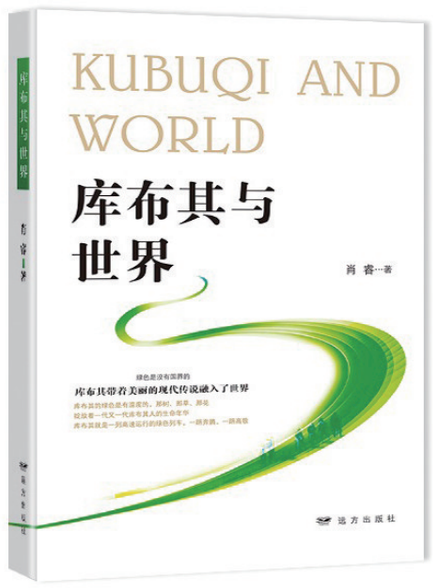
出生成长在这里的内蒙古作家肖睿对这片土地上的变化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跨越几千公里走访调研，同来自不同国家的治沙人沟通对话，查阅、积累了丰富资料，倾注大量心血创作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库布其与世界》。作品由远方出版社出版，以世界荒漠化治理标杆“库布其模式”为切入点，探究“库布其模式”如何从鄂尔多斯走向世界。全书时间跨度70年，集中彰显了“中国创造”“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5月30日，报告文学《库布其与世界》作品研讨会在北京、鄂尔多斯两地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会议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内蒙古文联、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办，内蒙古作协、鄂尔多斯市文联承办。

“它是属于库布其的，更是属于中国和世界的”

《库布其与世界》蕴含的是中国绿色发展的理念和智慧。“它是属于库布其的，更是属于中国和世界的。”内蒙古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冀晓青说，这部作品是内蒙古文学界回应时代重大关切使命担当，更是内蒙古青年作家以精品奉献时代、奉献人民的成果。肖睿不断在内蒙古大地上寻找写作的新资源，敏锐捕捉当下内蒙古发展的变迁与脉动，把自己的创作和更广阔的人群、更宽阔的生活现场连接起来，因此得以进入时代的内部、细部，有了无穷发现和无尽感受。

几年前，肖睿创作完成这部作品初稿后，中国作协曾专门组织过一次作品改稿会，邀请知名作家、评论家提出修改建议，如今三四年时间过去，当年参加过改稿会的许多人都对这位青年作家赤诚的创作之心印象深刻。



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说，和前几年相比，今天再看到的这部作品有了较大进步，作家以治沙人的精神来写治沙，充分体现了文学创作应有的态度。作品在主题方面更加具有当代性，时代特色愈加鲜明，从古到今、从国内到国外，创造了开阔的时间与空间维度。“既着眼于库布其这片土地，同时也把全国甚至国际视野中的很多人和事写进作品中。肖睿不是作为一个他者或者第三者来这里采风写作，而是灌注了生于斯长于斯的真切情感，这种叙述使得作品更灵动，艺术上更加成熟、完善。”

因为写的是家乡，肖睿对这片沙漠怀有特殊的情感。在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主任何建明看来，这部作品的创新性在于其中呈现的人物和治沙典型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而正是这些人的行动和精神改变了库布其的面貌，完成了一项被国家和世界永远铭记的伟大事业。作为土生土长的鄂尔多斯人，作者满怀对沙漠的复杂情感，叙述风格像蒙古长调一样充满悲悯之感。他认为，这部作品证明了内蒙古的青年作家正在茁壮成长，内蒙古的报告文学创作后继有人。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徐剑对治沙并不陌生，他认为这部作品比较可贵的是作者的真诚，对土地和治沙人的真诚尤其难得。该写的故事、该塑造的人物、该弘扬的精神，都被作家一笔一画写进作品中，“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真正走进去了，写出了一部治沙史，同时也是一部精神史，一部心灵史”。

一部治沙史，也是一部心灵史

在叶梅看来，《库布其与世界》全景式展现了库布其的治沙史，是一部别开生面的新时代生态文学力作，也是一部深入开掘库布其儿女心灵史、具有独特文学性和代表性的优秀作品。作品结构宏大、视野开阔，以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家园、我们的未来结构全书，故事精彩，人物鲜活，情感充沛，蕴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向未来的希望和活力，具备收放自如的节制和张力。

“这类题材的报告文学创作有一定难度。”黄传会说，许多生态环保题材的报告文学容易形成简单的套路，读起来很枯燥，但《库布其与世界》则非常丰富、丰厚、饱满。作品没有采取单线条叙述，而是采用一种新的结构向读者讲述一个个故事，推出一个个治沙英雄，并在塑造这些人物的同时穿插讲述库布其的前世今生，实际上也在讲述库布其的文化，生动呈现了“绿色没有国界”的理念。

这种张力来自于作者匠心独具的叙事风格。正如王宏甲所认为的，作品像草原上孕育出的文字，如诗如歌，饱含深情，那种语言感觉与雄浑的沙漠相映照，也与变成绿洲的家园相映照，映照出作者清澈的心灵。从中我们获得了大量关于沙漠的知识，读到了报告文学的真实性，也感受到浓郁的故土情深。“家乡需要这样的作家，只有他们才能够最真实、最深情地写出家乡的变化。”

贴着人物写，是很多人读完这部作品的感受。程绍武说，“贴着人物写”本来是沈从文介绍自己小说写作的经验，而这部作品也做到了这一点。它始终贴着人物写，通过人物的故事来表达主题，非常注重人物的刻画塑造，故事情节生动、细节丰富，这同许多报告文学作品的写法不同，文学性尤其鲜明，读后令人印象深刻。

“我深刻地意识到，库布其沙漠是人类精神的绿洲，写好真实的库布其生态故事，就是写好真实的、当下的人性奇迹。”该书作者肖睿的感悟令人动容，他坦言，利用多种手法与文体书写生态文明建设、书写沙漠的变化、书写库布其沙漠史诗，是自己这些年的创作核心，因为自己出生在鄂尔多斯这个曾经被沙漠环绕的城市，亲身经历了它变为绿洲的过程，见证了几十年来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它既有宝贵的历史意义，同时也有极高的文学价值，“我愿意在这块文学宝藏当中努力探索和挖掘，写出更多属于这片土地的动人的故事。”